

中国传播学的“中年危机”与华夏传播研究的球土化展望（2017-2021）

谢清果 王皓然

摘要

从华夏传播研究近五年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为适应学科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发展瓶颈所展现出来的积极变化。它正尝试以一种全新面貌应对学科和时代环境给出的机遇与挑战，并围绕中国本土传播实践中的传统思想观念、历史文化现象展开多学科、多维度探索。本文仅以最近五年来新闻传播学界重要刊物论文和相关著作为例证，分析华夏传播学研究呈现出的发展新态势。不同于以往，如今的华夏传播研究一面坚持自身具有民族和本土化立场的理论建构，一面则用开放态度回应全球化与现代语境。它正以全球本土化的独特视角，参与到本学科当下的许多重要议题当中，提供自身独特的思想贡献。

关键词

华夏传播研究、传播学本土化、全球本土化

作者简介

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电子邮箱：weirai2002@126.com。

王皓然，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marcotaiye@foxmail.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华夏文明传播的观念基础、理论体系与当代实践研究”（编号：19BXW056）成果之一。

The “Mid-Life Crisi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the Prospect of “Glocalization” of Huaxia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17-2021)

XIE Qingguo WANG Haoran

Abstract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e can see the field of Huaxia communication has made positive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 the chang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e bottleneck of its internal development. Huaxia communication studies is trying to respond to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rovided by the discipline and the environment of the times with a new look, and conduct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dimensional explorations around traditional ideas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in China's loc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development trend of Huaxia communication studies by taking the papers and related work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s example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today's Huax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dheres to its ow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with a national and localized stand, while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 contexts with a more open attitude. It is participating in many important issues in this discipline fro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global localization, and providing its own unique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Keywords

Huaxia communication studies, localization communication studies, global localization

Authors

Xie Qingguo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weirai2002@126.com.

Wang Haoran is a Ph.D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marcotaiye@foxmail.com

This article is one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under the general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in 2019 "Research on the Conceptual Basis, Theoretical System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Huaxia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Project ID: 19BXW056).

相较其他传统社会科学，传播学是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但如果将1978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举办的为期一周的“中国传学研讨会”作为开端，中国本土的传播学研究其实也已经走过了43年，属于“70后”。若我们将它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按照发展心理学的观点，这将意味着一个特殊的生理阶段：由于僵化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模式已经不能把握新的机遇和焕发创造力，往往带来心理上的繁衍感停滞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年危机”。它同样可以用于比喻中国传播学当下面临的境遇。

传播学的“中年危机”首先表现为对价值失范的困扰。在经历多年的高速发展后，我们发现在过去研究中形成的路径依赖正遭受挑战。一方面，传播学运用现有理论阐释和预测当下发生事物的能力、以及把握未来的信心正在逐渐流失。而另一方面，它为摆脱该困境的努力又深陷于学科内卷（韦路，2018），以致于尽管不断引入大量的理论资源，但传播学研究所能产出的知识却依然单薄（胡翼青，张婧妍，2018），并面临高度同质化的问题。

中年危机的另一体现是身份焦虑。作为一个横向学科，传播学并不对应某一类社会结构，而是和人类的行为特质有关（张国良，2018），它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几乎所有产品当中。但相比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学科概念，当今传播系统正在变成一个超社会系统或元社会系统（刘海龙，2018），由于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从信息产业和前沿科学领域中吸收新的概念，不断更新的常识和社会日益深度的媒介化进程，让传播学的研究边界趋于模糊和不稳定。我们会发现即便面对共同的研究对象，不同领域学者对它的理解却语焉不详或各执一端（潘忠党，2018），理论研究者的探讨与行业现实也产生偏离（朱春阳，2020），始终难以形成共同的认识和价值基础，身份危机便在其中自然发酵（张涛甫，2018）。它集中表现为对近年来建构新闻传播学科的主体性问题的关注（董天策，2018；潘忠党，2018），以期摆脱阈限焦虑并构建“主流范式”和“中心理论”，完成对传播研究的主体性体认（邵培仁，陈江柳，2019）。

内部发展瓶颈和外部环境变化构成了这场“中年危机”的两方面考验，进而要求新闻传播学的每一个细分领域都应对此作出积极调适。同样面临挑战的华夏传播学，则在过去五年传播学科乃至整个世界的断裂式剧变中表现出其韧性与适应力。它从过去相对传统的小众领域和封闭讨论中走向开放，以更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视野把握时代机遇，以更加充满自信、活力和想象力的姿态进入大众视线当中。本文仅以最近五年来新闻传播学界重要刊物论文和相关著作为例证，展示并分析华夏传播学研究呈现出来的发展新态势，并将此趋势归结为一种“全球本土化”的努力。

一、旧瓶装新酒：华夏传播的范式沿革和视野推进

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牵头组织、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参与举办了“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并于次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对会议的论文集进行整理出版。以余也鲁在会上总结时用的“从零开始”为题（吴予敏，2018），华夏传播研究就此启程。它以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为研究主要对象，将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现象与活动并推导中国当代社会实践为主要目标，既立足中国本土、历史，也面向当下、未来和世界，肩负着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黄星民，2002；谢清果，2017；邵培仁，2020）。如果我们将中国传播学四十年的发展历程看作以“本土化”为根本追求并不断深化认识强调创新的创业史，那么华夏传播研究便是这个“大气候”中的一番“小奋斗”，老一辈学者怀揣美好愿景展开对“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探索”（余也鲁，

2015: 229-230), 筚路蓝缕, 开创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学术道路。

(一) 认识进化: 面向本土、未来与世界的华夏传播研究

“从零开始”之说并非妄言, 鉴于当时中国传播学研究本身都还处在吸收模仿的起步阶段, 早期的华夏传播研究往往采取以西方话语为关照进行自我审视的方式实现与当时主流学术话语之间的对话(谢清果, 2017), 借西方传播学理论参照传统文化语境, 探讨它与本土传播实践与传播观念间的异同。这种研究思路过去被认为带有“民族主义”和“复古主义”色彩(王怡红, 胡翼青, 2010: 295), 简单地以西方的传播学概念来生搬硬套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学术标签化之嫌(尹连根, 2017), 确有历史局限性。究其症结, 这些努力试图在西方传播学的话语框架内实现本土化的理论创新, 学者们为实现中西之间的理论对话, 往往下意识将自身所倡导的“中国理论”“中国方法”与“中华范式”误作为西方理论用以比较和凝视的对象。过分强调通过中西对比发现中国的特殊性, 继而把“本土性”全然当作“特殊性”来进行阐释, 很容易重新落入新的“东方主义”怪圈中。这种后殖民主义话语时至今日仍在以不同形式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潜意识中我们还是会将“与世界对话”误解成与西方现有理论成果对话。以致“把他们的问题当作我们的问题, 把他们的文化当作我们的文化, 把他们的体验当作我们的体验”(潘祥辉, 2018a: 335)。

近年来, 在朝着理论建构方向挺进的过程中, 华夏传播对自身范式的思考也愈发深入, 逐步意识到横向的中西对话存在理论切割材料的潜在弊端, 也更加侧重对历史语境的纵向传播考古(姚锦云, 2020)。致力于从中国古人的经验去检验或发现古代传播的“中层理论”(吴予敏, 2018)。或尝试从传统观念、日常语言出发形成具有本土色彩的理论(姚锦云, 邵培仁, 2018), 或尝试跳出舒适圈, 以传播学的独特视角切入到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当中(潘祥辉, 2021)。

在对传播学认识结构的反思过程中, 有学者提出从“传播的传递观”到“传播的接受观”的视角转换, 探讨不同传播主体间的关系的可能, 以建构新的本土概念(姚锦云, 邵培仁, 2018; 姚锦云, 2019)。也有学者认识到, 西方传播学研究从逻辑前提上就存在的主体预设, 由此从庄子的“吾丧我”思想出发探讨了这种以主体性消解实现主体敞开的思想, 以及可能存在的“物化”式的主客交融的本土传播学意蕴(李红, 2019)。

激发华夏传播研究的想象力, 关键在于反思西方传播学理论框架(吴予敏, 2018), 尤其是修正以“传播学思想”为坐标系界定“传播思想”的偏颇认识(姚

锦云, 2019), 传统思想观念范畴、历史实践和其他地方性知识正越来越得到重视, 复杂的意义政治和文化语境也越来越成为思考的焦点。若以社会学与史学等学科的本土化实践为参照, 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实现传播学理论本土化的复杂性。它需要诉诸于多层次的路径探索, 例如既要诉诸社会学式的“文化自觉”, 也不能缺少哲学层面的思辨以及历史学层面的传播活动诠释等等(尹连根, 2020)。

总的来说, 华夏传播虽一头钻进研究传统社会语境的“土问题”中, 却不只把自己作为一门只管埋头深挖的“巷道工程”, 至少在对自身范式和方法论的思考上, 它是很时髦的。它始终秉持着前卫和开放的态度, 吸收前沿理论适应学科环境, 同时始终坚持对话和反思西方传播学理论范式的立场。并且, 对于自己的定位也不再停留于传统社会科学封闭的知识体系内, 更尝试依照当下传播研究领域多学科和开放性特点, 将传播学构想为摆脱学科建制以共同价值为导向的整体性研究领域(邵培仁, 陈江柳, 2019)。

(二) 方法创新: 用多学科、跨文化方法激发学术潜力

华夏传播在学术主体性上的发展一方面获益于学界近年来反思学科发展路径和价值取向的整体思潮, 一方面同样归功于同仁们具有创新意识和想象力的研究成果。

面对广泛存在于传统哲学范畴、历史文本乃至当下我们日常文化生活中的传统传播思想观念, 相关研究在广泛吸取不同领域的经验智慧的基础上形成了非常多元和具有自身色彩的方法工具箱。首先是以跨学科的活跃思维将民族考古学、古文字学研究用于推论和理解原始社会中的交往观念和媒介技艺(林凯, 谢清果, 2021), 基于出土文物研究推断中华传统价值秩序如何通过原始活动被塑造(陈月华, 潘沪生, 2020)。又或者借鉴历史人类学的民间文献与田野研究方法对祭簿、曲艺等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实践开展研究(庄曦, 何修豪, 2020; 李乐, 2020), 以此形成从文本内容的阐释到历史语境还原、再到社会功能分析的传播社会学分析路径(李东晓, 2020)。

另一些研究则代入微观的历史场景和特殊历史视角, 拓宽我们对某一历史时期社会传播活动整体面貌的了解。比如卞冬磊(2018)以《林则徐日记》为主要线索, 仅从“林则徐去广州”这样一个极微观的叙事对象出发, 管窥十九世纪中前期中国社会传播网络的特征与潜在问题。龙伟(2021)以票号商业通信档案为线索, 尝试对清末民间通信的传播速度进行可以量化的比较和观察, 由此考察近代社会的变革条件。

除了古老的文化遗存，也有学者将目光置于传统社群、传统意识在现代媒介环境中的实践状况。以规范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考察传统村落社群，探讨伴随媒介和传播而展开的传媒空间、身份认同、交往网络等过往人类学不太关注的领域和议题（孙信茹，2017；孙信茹，王东林，2019；杨星星，唐优悠，孙信茹，2020）。抑或是摒弃过往传播研究的文本中心主义取向，转而寻求一种行动中心主义假设，尝试以微观的、日常的、行动取向的思路考察一个传统传播观念在现代语境下的实践问题（林羽丰，2020）。

在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的过程中，华夏传播的学术目光投向更加多元的研究对象，同时在对研究文本的选取和处理方式上也有了更多的新认识。除了传统的经典文本之外，也尝试通过笔记、日记、历史、故事、小说等文本探寻古人真实生活或精神世界（李红，2020）。在诸如《水浒传》这样的文学经典中，其实就投射了作者实际身处的明代社会中新闻与传播活动现实状况（尹韵公，2020）。而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大量图像和声音文本同样可以通过视觉分析来理解其生产和传播中的过程机制（陈阳，2021）。

各种方法探索中，潘祥辉提出的传播考古学或许最能代表华夏传播研究特色。按其荣获中国新闻史学会传播思想史委员会2018年度“最佳著作奖”的《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一书当中的定义，它代表着一种“对古代传播媒介或传播现象进行的正本清源式的研究”（潘祥辉，2018a：7）。数千年赓续不断的华夏文明缔造了我们独特的民族语言和文字，而由于汉字的传承性特点，它既作为一种现代表征，又留存着自原始社会文字形成以来就内涵的观念意向。陈寅恪先生便有“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说法，而潘作以训诂学方法为基础，以传播学的认识和思维方式为索引，对一些汉字背后的传统传播观念进行了非常精彩的释读。如从“宣”字看到传统政治传播思想中偏重德化的抽象情感性（潘祥辉，2018b）；从“媒”字看到女性在古代文化实践中如何充当“生物-社会”复合型媒介角色（潘祥辉，2018c）；由“圣”字的媒介学意义看到“圣人”在巫术文化传统中所被赋予的独特想象（潘祥辉，2016）。杨柏岭（2021）对“化”字从其文字学到观念史的考察，阐释了“化”的观念如何贯穿于中国文化对传播互动的独特理解中。

除了能够从前沿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汲取方法养分，华夏传播同样在重新发掘学界关注的中国古代和近代知识传统这座富矿，包括训诂学、谱牒学、金石学等都得以在华夏传播研究的探索过程中焕发新生，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实践中特有的研究

对象和文本被纳入到研究视野当中，真正做到以本土思维和本土方法来理解本土实践。长期受困于缺乏理论和方法自觉的华夏传播研究，正通过对“本土性”和“跨学科”的深入认识与广泛学习补齐过往短板。它愈发注重以问题本身而非以方法为导向，相较新闻传播学科传统中对方法的过度类型化和概念化的思维惯性，更展现其自身灵活性。

二、单向与多维：华夏传播的多元视角与本土理论建构

传播学作为现代性的知识建构，以其现有理论框架反观传统历史文化的可行性仍存在不少争议。而研究中国的传播问题也不应只是验证西方传播理论的有效性和普适性的实验室，更需立足于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提供自己的经验和创意，构筑自己的观念和理论（吴予敏，2018；吴予敏，2020）。近五年来，学者们基于本土语境和历史实践正在更丰富的层次和更多元的主题中探索本土理论建构的可能。它的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拓展，将传统和现代交织的多元主题共同纳入到本土化的思考当中，具有很强的策略性和针对性，既扬长补短又充分展现了本土思维特色。

（一）发挥特长：聚焦古代新闻和政治传播实践

新闻史研究理应说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科中最具传统且成果突出的领域。它长期以来围绕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产出的丰硕研究成果，是我们了解本土新闻和出版活动历史，尤其是古代政治传播实践的重要入口，也与关注本土历史实践中的传播思想观念的华夏传播形成了良性互补。因而尝试运用学科优势，充分利用新闻史研究所提供的研究范式和实践样本，正在促进华夏传播对中国古代传播实践及其所反映的思想智慧的进一步深入思考。

整体上看，中国古代的大量出版和信息传播活动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学者们往往着手于单一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导向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传播因素。比如中国古代的历书发行就是长期由官方垄断的业务，这种垄断反映了从中央到民间个体一元化的传播格局以及它维系统治权威的特殊职能（汪小虎，2020）。而以《中庸》为代表的儒家四书经典的形成，同样是宋代出版实践沿革的结果。雕版印刷的普及运用以及官方出版活动的推广，不仅以其新的媒介逻辑重塑了宋代士人的交往方式，也间接促生了南宋的理学文脉（杜恺健，谢清果，2019a；杜恺健，2019b）。兴于传统出版行业的理学文化，其衰亡同样与西方近代报业体系的冲击息息相关，受此影响的清代儒学思想家更关注客观世界，更具实用主义情怀，理学思想也因之衰落（赵云泽，刘珍，2020）。作为替代，在报刊影响下的晚清文人则

完成了书写文化的转型以及士人群体的重新分化（褚金勇，2019）。

刻板印刷带来宋代出版业的繁荣，而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特点，官方的深度参与则让它衍生出异常丰富的历史现象。比如宋代政治新闻传播的主要机构进奏院制度，就是围绕新闻的抄发、镂印、传播工作沿革形成的，它使得中央权力可以借由信息传播向地方延伸。在政治实践中，信息传播作为一种权力必然引来新的博弈，比如围绕它的定本模式演变的皇权与相权斗争（魏海岩，韩立新，陈建群，2021）。也因掣肘于复杂官僚体系和过度博弈导致的效率低下，间接带来民间新闻业的发展空间（赵云泽，董翊宸，2021）。以技术进步为主导，在传播活动中信息活动样式的转变和重新赋权都会引发新的权力博弈。我们由此即能够以新闻史和技术史视角，理解报禁和文字狱等现象缘何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出现（郭志菊，2018）。同时还可以明显看到它对后世官方与民间历史修纂活动产生的重大影响（魏海岩，宋妍，刘诗萌，2017）。

新媒介取代旧媒介，往往意味着新文化驱逐旧文化，新制度替换旧制度。单以从简牍到纸张的书写载体转化过程为例，基层政治重心的上移、中古时代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新兴士绅阶层进入历史舞台、“皇权不下县”的古代政治传统局面形成其实都和造纸普及导致的“基础帐簿制作主体由乡变为县廷”这个看似微小的历史变化直接相关（张荣强，2019）。在活跃的宋代新闻出版史研究中，许多学者以全景式的共同还原展示了微观的媒介技术和传播活动变革如何影响整个时代场景。我们得以以新闻史研究所揭露的某一时代场景下的某一具体传播实践为支点，撬动对中国本土传播实践、观念整体性和规律性的认识，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实践的深刻智慧和宝贵经验。中国古代这种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传播实践模式，既制衡了传播的偏向，保持结构运行的长久生命力（徐燕斌，2017），又可以类推广延到基层社会生态、民间传播活动等当中去，让我们更加接近于对中国传统传播观念、思想智慧的全貌性了解。

（二）补足短板：对本土媒介实践的考察与阐释

新闻史研究是华夏传播可以借力的一块“长板”，但实现传播学从理论到范式的本土化创新还在很多方面需要另外补课。长期以来，过度地依存新闻传播学的学科概念框架对中国传播思想史的研究造成了自我限制，它已经习惯于在邸报、塘报、民意、谣言这些规范概念下面耙梳（吴予敏，2018）。因此，也有许多学者把视角转向传统文化实践和生活情境当中更加广泛存在的生活媒介，进而关注生活媒介如何形塑了中国人的交往观念（谢清果，2019a）。

这些媒介有些是具有鲜明物质特性的，比如中国古代石刻文化。作为物质载体的石刻因其神圣性、永恒性、稳定性和公告性而拥有建构时空观念、“装置”信仰的作用，由是在秦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扮演着特殊角色（贾南，芮必峰，2018）。又或是孔庙这一兼具时间与空间偏向性的祭祀空间，以其“隐形传承者”的媒介角色在中华文化的传播中扮演着先进的功能（张兵娟，王闯，2018）。同理，在明末清初时期出现的教堂，因其对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分配而构成谣言生产与传播的内外生因素（汪金汉，2019）。

另外一些媒介则作为民间习俗或制度化结构存在于我们的历史文化当中。比如“瞽矇传诵”这一诞生自原始口传社会中的文化传统，事实地缔造了盲媒这样一种职业传播者群体，继而在上古时代的“乐教”和“声教”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潘祥辉，2019）。在先秦时代，歌谣扮演着与后世不同的重要角色，尤其是以它为载体所实现的政治表达、宣传教化、政治监督、舆论动员以及权力博弈构成了华夏文明早期的许多独特面貌（潘祥辉，2017）。盲媒和歌谣的社会性传播功能之所以可能，重要原因来自华夏文明本身浓厚的巫术文化渊源，许多由远古巫术活动演化而来的文化仪式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的特殊作用自不必多言。张振宇（2021）便以当下社会面临的疫情为背景，考察秦汉时期祈神免灾的仪式传播活动，通过这项由统治阶层不同集团共同构建的维稳机制中不同主体的权力博弈，为当前时代的危机应对提供启发思考。

身为中国古代社会传播结构的一部分，许多媒介一直随历史及其自身功能的演进不断产生形态变化，比如起源于东汉“露布”。作为一种政令公开方式在历史当中就几经流变，也牵涉了多种政治力量基于媒介所展开的多维实践（赵云泽，楚航，2017）。又比如中国古代的家训文化，作为原始父系社会就已经存在的通过家庭内传播实现权力传承的行动机制，也经历了一种文学化和媒介化的转化，最终形成以宗族为基本单位，以家族先辈为主体，以存续家族资源为目的特色传播控制实践（谢清果，王皓然，2021）。中国发达的史学传统本身在政治传播生态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其自成体系的连续性记录方式通过历史书写与传播实现了政治的“史论监督”功能。它不仅仅在上古社会中起到约束军权和官僚体制的作用，对中国近代新闻视野也有一定理念影响（李晓东，潘祥辉，2019）。

这些媒介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形态，自然应被赋予不同的功能想象，比如在春秋时代，鼎作为礼器其铭文和形制都有鲜明的宗族性特征，它本身是一种实现宗族分封政治的连接媒介。而战国时期出现的“铸刑鼎”却逐渐走向平民化与生活

化（王沛，2019），成为国家法律制度的媒介化载体。有些媒介实践的沿革由于和特殊的历史阶段、历史实践相互交织，往往能够形成影响深远的文化变革。赵云泽等人对汉字沿革的不同时期考察，就揭示了甲骨文向鼎彝金文转变、秦代文字统一改革两场媒介革命过程如何分别地改变了中国的文化面貌和历史进程（赵云泽，董翊宸，2019；赵云泽，杨启鹏，2019）。前者将文字从一种“人与神”的媒介转化为“人与人”的媒介，构建社会理性交往的基础资源和中华文明的基石。后者则实现了文化统治和制度重塑的过程，使得秦朝“以吏为师”的思想得以推行，是秦代和后世建立起高效中央集权官僚系统的基础，中国古代“理性政治”因此成为可能。

更加注重自身的历史意识，更加注重从具体文化实践情境中入手，更加关注地方化、日常化和私人化的“小历史”，让我们能进一步超越传播学既有的西方理论框架，看到研究对象和问题之间的内在机理、多样性与复杂性，在学科话语的解构与重构中形成本土化思考和历史书写。

（三）本土思维：在以我为主的理论对话中拓展新版图

依余英时先生的评价，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余英时，1999：459）。华夏传播学的愿景，始终是尝试建立具有深刻独立意识、民族立场和本土实践价值的传播学理论与范式。但这种尝试又并非特立独行“自成一派”，也并不寻求将中西实践、理论和范式简单对立。当下的华夏传播研究正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将自己推入学术市场，秉持“以我为主”的主体意识和“中西对话”的理论追求，实现与西方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和学术体系间的批判性对话。

近年来还有一些研究选择关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特殊概念或范畴，对当中的传播观念展开探讨。比如“化”这样的本土哲学概念，在儒释道三家的不同阐释中实际建构起了各自富有本体论意义的传播观念，同时又蕴含类似“传-受”一体化的传播效果论等思想共性（杨柏岭，2021）。在对龙山文化以降的历代考古发现的梳理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中”与“中和”的文明理念如何被以不同形式的物质媒介呈现和传承，构成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文化逻辑（刘庆柱，2019）。又或是从中华文化在思考人的主体性问题时具有的时间偏向性，看到它如何塑造儒释道三家对于时空多元的理解和阐释（谢清果，王婕，2020）。

另一些优秀成果则对传统文化经典文本及重要思想家展开再挖掘和再阐释。张明新等人从《论语》的文本出发，探讨儒家对于建构政治信任的观念和路径认识。

其中既有“自上而下”的体制价值传播以设置理想化的政治认知框架,也有“自下而上”的政治情感传播形塑政治信任。由此“上下交”的双向传播路径整合,才实现了“同其志”的政治信任建构(张明新,陈佳怡,2020)。潘祥辉(2020)则聚焦东汉中后期社会政治批判思潮的开风气者——王符。王符对东汉的吏治、社会风气及政治传播失灵现象有着深刻的洞察和批评,进而对君臣、官民之间的政治沟通,对克服政治传播的信息壅塞及信息扭曲提出一系列主张。

这种对经典文本的再阐释也可以在比较哲学对话中找到新视角,从胡塞尔哲学的几个核心概念阐释先秦儒家人际交往思想的价值和可行性(束秀芳,芮必峰,2018)。通过从认识本体出发的传播观,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中以自我传播为思考起点、推论与他人和世界的交流关系的思考模式,进而理解儒家诸如“内圣外王”这样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的传播观念(谢清果,2020:178-179),更可以为芝加哥传播学派代表的建构主义的自我观提供新的思想资源(赵妍妍,2021)。又或者我们还可以从修辞学的视角上看到,中国人的交流活动讲究意境、内涵和隐喻关系,将西方修辞学强调的辩论、逻辑包裹在美学和情感的温暖外衣当中,这也让中国传统的人际交流和说服活动有了其独特性(谢清果,米湘月,2019)。笔者主编的“经典与传播研究丛书”系列近年相继出版了《中庸的传播思想》《庄子的传播思想》与《论语的传播思想》,便是希望能在华夏传播积淀深厚的领域继续深耕,实现文化经典与现代理论的跨时代对话。

中国文化中深藏的传播观念与智慧,浸润在我们的哲学理念、国学经典中,更以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深度融合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实践与文化变革中。而对它的探寻往往需要一场像捉迷藏般,从文明的源头和字里行间的耐心推敲。比如钱佳湧、刘辰辰(2019)二人的研究就探讨了上古时期“绝地天通”的巫术革命如何彻底改变华夏民族的历史面貌。它从逻辑上将权力秩序视作宇宙运行秩序之现实映射,进而合理化了权力集中化的现实,让民间巫术信仰收归于王权垄断。这种思维方式从上古的“绝地天通”中产生,并一直主导着中国人自然宇宙观和传播过程中的行动理论,它也为我们从本土语境中理解“传播”寻找到新的阐释可能。

从原始巫术信仰当中脱胎换骨的中华文明,以“礼”和“乐”创造性利用了巫术仪式中的外在表征,并转化其价值内核。“礼”的传播意义或功能常为我们津津乐道,而“乐”对礼制生成的意义则惯被忽视,以“乐”观“礼”,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相互协调的运转机制,是古代中建构社会政治秩序的文明传播基础范式(张丹,2020;谢清果,林凯,2018)。赵晟(2018)的博士论文则揭示了存在于儒道

两家认识论中潜藏的身体意识。它们在对内向传播和交往观念的思考中都带有鲜明具身性思维，从而构成内外统一的身体交往观念。

凭借对过往忽视的领域、文本和思想传统与历史活动的重新认识，更凭借着对中华文明的范式自信与方法自觉，华夏传播研究正在不断拓展知识边界，补全自身的研究版图，形成为更具系统性的分支学科。邵培仁、姚锦云合著的《华夏传播理论》（2020）作为一部系统性探讨华夏传播问题意识、方法启示和理论贡献的重要著作，不仅回答了华夏传播理论是否可能、如何可能以及如何建构等问题，而且创造性提出“从观念到概念、从思想到理论”的建构路径，依据中华文化基因和传播元素探索性地提出一系列华夏传播理论观。既表征了华夏传播研究在全球传播时代的觉醒与现实，也丰富了华夏传播理论的认知与想象。而笔者的《华夏文明研究的传播学视角》一书立足中国话语，探究“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华夏文明的行动模型，“中庸行世”为特征的华夏文明的调适观念等，以求系统呈现华夏传播观念体系。同时，《华夏传播学年鉴（2020）》的推出，以及“华夏传播研究论丛”系列《海外华夏传播研究（陈国明卷）》《华夏传播研究在中国（谢清果卷）》《华夏传播年鉴（2019卷）》首批三册本都是组织华夏传播经典成果并展开学科书写的尝试。当中大量海外学者研究的中译本都是首次出版，对华夏传播研究的历史溯源进行了新的延展。更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华夏传播研究草创的设想和路径探讨，深化对华夏传播研究发展逻辑的认识，强化学科意识。

三、从中国到世界：华夏文明传播的“出圈”尝试

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发表的有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讲话，为当下的新闻传播学科赋予了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以提升国际政治传播能力的时代使命，为华夏传播指明更加广阔的学术前景和发展道路。如果说过去的华夏传播学强调立足于本土语境，以地方经验建构更加适用于本土和本民族的理论范式，那么新的时代使命，则让越来越多学者敢于用本土话语来为更多当代性的和世界性的命题寻找答案。许多相关研究正致力从中国对外传播交往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条有别于过去指导范式的“中国模式”，以实现对国际话语权和话语解释权的争夺（白文刚，2019）。

中国对外文明交往的历史经验表现出了非常鲜明的双向对话特征。围绕着两种文明间理解和冲突的多元互动，使得“传播”本身更像是一个不断致力于寻求深层次对话与互构的动态过程。以十六世纪史料还原出的英国国家记忆中的中国形象

让我们看到,这种对话过程往往具有鲜明历史性,是特定条件下传播活动的结果,是作为客观交流条件和具有局限性的主体视角的共同呈现。在中英尚未直接接触的16世纪,英国多通过间接素材从地理、人文和商贸三个维度勾勒中国形象,这与这一时期英国对海上权力的谋求、国家制度的设计和对贸易逻辑的认知紧密联系,它启始于物质性认识,其形象又在力量对比消长中不断变化(王润珏,2020)。十九世纪逐步进入中国民众视野的画报媒介也起到相似的历史作用。通过画报的图形叙事,下层民众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想象被具象化为一个发达的“西方文明”(黎藜,2020)。

从本质上讲,近代文明史中的对话往往并非观念与观念,思想与思想间的直接对话,它们都有其物质性载体。中国与周边和海外民族的交流互动就可以从游牧服饰装饰符号的流行变化中循迹(李楠,张焱,2020),也可以从商品流通和饮食文化的物质交往史中看到,丝绸之路沿线的全球贸易如何促成文明交流、融合与演进(杜莉,刘彤,王胜鹏,2020)。即便放眼现代,以茶叶商品贸易为媒所开展的国际传播同样是消弭各国各地区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和思维隔阂,最终化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之困可资借鉴的案例(杨懿,2020)。

无论十九世纪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考察贯穿中国西北及整个欧亚大陆的贸易和交流通道时,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还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形成与内涵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对异域文明丰富的物质性想象(毛章清,张雪,2017),也当被看作是一种殖民主义话语的对应产物(王小英,2017)。但张兵娟等人的研究却从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来华导致的“礼仪之争”中看到了物质主导的文明交流形态并非一种必然,而更像是西方殖民主义观念的产物。借助后殖民理论和传播学视角重新审视传播动机、传播手段及由中英价值观念偏差导致的认知障碍等因素,我们当意识到西方殖民历史只是书写文明交流史的可能方式之一,因此要更加重视文明交往史书写中长期的主体性缺失(张兵娟,李阳,2020)。脱离近代文明史的狭隘框架,我们应该看到,随着物质交往的推进,跨文化交流终将进入到更深层次的理论、身份和权力冲突当中,而所谓冲突本身就代表着融合的过程,什么样的冲突往往造就什么样的融合(赵立敏,2020)。文化交流的冲突过程就是一个冲突内容被转化、规范,进而被冲突主体内化为其文化秩序一部分的过程。所以文化传播的最终理想状态一定是无分主客、内外的共生共构状态。在这点上,“中国”便是最能代表该文明传播观念的元符号,它主导的古代东亚文明交往实践塑造了无外、共生的传播秩序,使得域内文明都可以从文明交往过程中共同获

益,形成共同维系和发展的文明共同体(谢清果,2019b)。

这些研究既以不同角度回顾了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经验,又体现了华夏传播对本土话语的重视,不断尝试对西方民族国家叙事框架下的国际传播话语逻辑提出挑战,设想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世界交往秩序。在过去,与主流范式的疏远关系一直是华夏传播走出相对封闭的讨论环境并为传播学科提供理论贡献的一大劣势。那么如今,这种劣势反倒成为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过程中,让它得以发挥特长实现“出圈”的优势所在。越是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探索,越是能体现出寻求新道路模式的世界价值,而对外政治传播和文明传播研究,也正在成为华夏传播探索发展的一座新的理论富矿。

四、变与不变:华夏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取向

笔者五年前曾撰文《2011—2016:华夏传播研究的使命、进展及其展望》,而又一个五年过后,华夏传播研究发生了许多一如期望中的变化,同时也正面临许多意料之外的挑战。本文以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年危机”为引,希望能从大环境反思华夏传播近年来的总体发展趋势。

一方面,由于过去四十年中,中国传播研究始终存在西方理论体系与自身经验及社会体验的相互割裂,我们被认为“既缺少在自身经验内部寻求关联和统一解释的努力,也缺少将西方理论还原到自身历史语境下的意识”(单波,2018)。另一方面,当前环境又决定过去狭义或纯粹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当代中国发展的期望(谢伏瞻,2019),它亟待寻求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新理论阐释和引领当代的和中国的具体实践。传播学面临的“中年危机”挑战,就是克服内部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并适应外部环境的需求变化。华夏传播研究近年来的变化,则可以被看作中国传播学本土化发展对新的内外环境作出适应调整的缩影,我们可以大致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的开放性正在增强,更加追求方法和范式的多元化。华夏传播不断尝试吸收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及考古学等不同学科方法,对形式丰富的中华文化开展多样化分析。尤为明显的是,当今的华夏传播不仅以中国的传统历史实践及文本为研究对象,还尝试对中国传统人文学科方法加以现代转化和应用。

其次,它的研究视野和讨论维度正在拓展。前者表现在关注多样化的中国古代传播实践,很多过去未得到关注的历史现象、特殊文本重新受到学者关注。后者则体现为华夏传播不再只强调建构有别于西方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地方性知识,随着它

对本土传播实践、对传播学本身理解的加深，它同样在运用传播学的问题意识与思维特点来重新阐释中国的历史实践，从中验证并总结一些不单是地方性，也具有普适意义的传播问题和传播规律。

最后，随着学科主体意识的不断成熟，华夏传播研究正在变得更加自信，它已经敢于参与到新闻传播学界当下几乎所有重要议题当中。而于2018年6月顺利创刊的《华夏传播研究》辑刊以及2018年9月华夏传播研究会的正式成立，则标志着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不断拓展。它们将为华夏传播研究提供新的坚实阵地，并更加自信大胆地尝试将自身带有民族性和地方性色彩的鲜明话语用于全球性实践的讨论中。兼具本土视野和全球情怀是华夏传播研究始终秉持的价值传统，它不单面向过去、面向本土，也同样面向当代、面向世界。就如《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一书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视角挖掘中华传播智慧的世界意义一样，华夏传播正以其本土化的独特视角，为崭新的全球化理论话语作出贡献。这种“球土化”展望，是接下来一段时期内它对自身的首要学术定位。

毫无疑问，时代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剧变既为华夏传播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挑战，也提供了独特的窗口机遇，它因此正在进入自己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时代。甚至可以大胆点说，近来的华夏传播研究虽不是最热门的，却称得上是“最热闹”的。相比一团和气的整个新闻传播学界，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基于学术观点和立场的交锋与商榷，而这种争议性和特别的讨论氛围恰恰能说明当前它具有的学术活力与吸引力。它正以开放姿态继续尝试构建具备多学科视角和全球性视野的本土话语体系。我们也将看到，未来在传统文化复兴、本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强化对外文化传播和国际政治传播能力等重要课题中，华夏传播所能够提供的独到思考与理论贡献，继续扮演沟通传统和现代、本土与世界的桥梁角色。

就像“幼儿期”和“青春期”一样，“中年危机”是生命历程无可避免的一部分。但不同于人类的是，传播学的学术生命还会很长，经历过一场小考后，无论华夏传播学，还是整个中国传播学学科，终将会以崭新而具有活力的新面貌，继续迈向未来。

（责任编辑：秦艺丹）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白文刚（2019）。文明传播视野中的“中国模式”与“中国故事”。《新闻与传播评论》，（6），5-16。
- 卞冬磊（2018）。林则徐去广州：19世纪中国“传播网络”的一个片段。《国际新闻界》，

(11), 6-21。

陈阳(2021)。中西交流视野下晚清酷刑的图像传播研究。《新闻大学》，(3)，99-109。

陈月华，潘沪生(2020)。从图案化影像遗存探析我国原始游戏中的价值观塑造传播。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9)，16-21。

褚金勇(2019)。媒介与书写：报刊媒介影响下晚清文人的书写转型。《新闻春秋》，(6)，28-34。

单波(2018)。从新体用观的角度建构中国传播学的反思性。《国际新闻界》，(2)，15-21。

董天策(2018)。新闻传播研究的主体性。《新闻与传播研究》，(S1)，101-102。

杜恺健(2019a)。赋权的转移：媒介化视角下的四书升格运动——以《中庸》为例。《现代出版》，(4)，88-93。

杜恺健(2019b)。《宋代<中庸>元典化的媒介研究》。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论文。厦门。

杜莉，刘彤，王胜鹏，张茜，刘军丽(2020)。《丝绸之路上的华夏饮食文明对外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

郭志菊(2018)。从版印媒介技术发展看宋代的文字狱及书禁报禁。《新闻大学》，(3)，23-30。

黄星民(2002)。华夏传播研究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4)，80-86。

胡翼青，张婧妍(2018)。中国传播学40年：基于学科化进程的反思。《国际新闻界》，(1)，72-89。

贾南，芮必峰，2018。作为信仰“装置”的秦汉石刻：一种媒介学的视角。《现代传播》，(11)，53-39。

黎黎(2020)。陌生的文明：清末画报中的西洋想象——市井视角中的西洋。《新闻春秋》，34-39。

李东晓(2020)。“唱新闻”：一种地方说唱曲艺的传播社会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8)，94-108。

李红(2019)。庄子的“吾丧我”：主体趋近世界的路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24-31。

李红(2020)。反诸求己：华夏传播研究的范式。《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74-82。

李乐(2020)。唱新闻：浙江传统乡村的声音景观和感官文化。《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67-71。

李楠，张焱(2020)。跨文化视野下中国游牧服饰之媒介功能与意义。《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5)，84—88。

- 李晓东, 潘祥辉(2019)。“史论监督”: 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监督机制溯源。《新闻与传播研究》, (10), 105-125。
- 赵立敏(2020)。理论、身份、权力: 跨文化传播深层冲突中的三个面向——以汉传佛教在华传播为例。《国际新闻界》, (9), 23-42。
- 林凯, 谢清果(2021)。重返部落化: 结绳记事的传播模式、机理与功能探赜。《国际新闻界》, (2), 159-176。
- 林羽丰(2020)。月子传授: 行动中心的传统传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 (9), 64—77。
- 刘大明(2019)。宋代邸报诗的新闻传播活动价值。《国际新闻界》, (6), 164-176。
- 刘海龙(2018)。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国际新闻界》, (2), 37-46。
- 刘庆柱(2019)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 (12), 4-27。
- 龙伟(2021)。清季民间通信的传播渠道及其速度——基于严修日记与山西票号通信的观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6), 53-57。
- 毛章清, 张雪(2017)。郑学檬教授谈“东方想象: 海上丝绸之路的边际效应”。《国际新闻界》, (2), 174-176。
- 潘祥辉(2016)。传播之王: 中国圣人的一项传播考古学研究。《国际新闻界》, (9), 20-45。
- 潘祥辉(2017)。“歌以咏政”: 作为舆论机制的先秦歌谣及其政治传播功能。《新闻与传播研究》, (6), 68-86。
- 潘祥辉(2018a)。《华夏传播新探: 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潘祥辉(2018b)。宣之于众: 汉语“宣”字的传播思想史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 (4), 76-94。
- 潘祥辉(2018c)。“秦晋之好”: 女性作为媒介及其政治传播功能考。《国际新闻界》, (1), 109-127。
- 潘祥辉(2019)。瞽朦传诵: 先秦盲媒的传播考古学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 14-23。
- 潘祥辉(2020)。“潜夫”之论: 东汉王符的政治传播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3), 50-58。
- 潘祥辉(2021)。文明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媒介考古学需要返本开新。《教育传媒研究》, (3), 34-36。
- 潘忠党(2018)。走向反思、多元、对谈的传播学。《国际新闻界》, (2), 47-52。
- 钱佳湧, 刘辰辰(2019)。“交通”天人: 商周时期巫文化演进的传播考古研究。《国际新闻界》, (11), 89-114。

- 邵培仁(2019)。人类整体传播学: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传播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7),13-20。
- 邵培仁(2020)。面向现在、未来和世界的华夏传播研究。《现代视听》,(6),85。
- 邵培仁,姚锦云(2020)。《华夏传播理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束秀芳,芮必峰(2018)。先秦儒家人际交往思想重估与再释——基于胡塞尔现象学视野。《新闻记者》,(2),58-65。
- 孙信茹(2017)。田野作业的拓展与反思——媒介人类学的视角。《新闻记者》,(12),70-78。
- 孙信茹,王东林(2019)。微信对歌中的互动、交往与意义生成——对石龙村微信山歌群的田野考察。《现代传播》,(10),19-25。
- 汪金汉(2019)。教堂空间与谣言的生产:明末清初反教谣言的传播学分析,(6),35-41。
- 汪小虎(2020)。中国古代历书的编造与发行。《新闻与传播研究》,(7),111-125。
- 王沛(2019)。刑鼎、宗族法令与成文法公布——以两周铭文为基础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3),85-106。
- 王润珏(2020)。探索与想象:16世纪英国国家记忆中的中国形象。《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62-66。
- 王小英(2017)。“丝绸之路”的语言学命名及其传播中的话语实践。《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1),84-90。
- 王怡红,胡翼青(2010)。《中国传播学三十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韦路(2018)。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与反思。《国际新闻界》,(2),154-165。
- 魏海岩,韩立新,陈建群(2021)。皇权和相权争夺中的信息控制:宋代邸报定本模式演变考。《新闻与传播研究》,(8),95-109。
- 魏海岩,宋妍,刘诗萌(2017)。中国古代官报入史考。《新闻与传播研究》,(3),64-83。
- 吴予敏(2018)。从“零”到一:中国传播思想史的书写和展望。《国际新闻界》,(1),90-108。
- 吴予敏(2020)。中国传播研究的再出发。《新闻与传播评论》,(2),1。
- 谢伏瞻(2019)。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5),4-22。
- 谢清果(2017)。2011-2016:华夏传播研究的使命、进展及其展望。《国际新闻界》,(1),101-117。
- 谢清果(2019a)。《华夏传播研究:媒介学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谢清果(2019b)。共生交往观的阐扬——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5-13。
- 谢清果(2020)。《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谢清果，林凯(2018)。礼乐协同：华夏文明传播的范式及其功能展演。《新闻与传播评论》，(6)，59-68。
- 谢清果，米湘月(2019)。说服的艺术：华夏“察言观色”论的意蕴、技巧与伦理，《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0)，98-104。
- 谢清果，王皓然(2021)。以“训”传家：作为一种传播控制实践的家训。《新闻与传播研究》，(9)，75-92。
- 谢清果，王婕(2021)。与时偕行：华夏文明传播的时间偏向。《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3)，41-53。
- 徐燕斌(2017)。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与社会控制述略——基于媒介史的视角。《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0)，51-56。
- 杨柏岭(2021)。本体、认识与价值：中国古代“化”观念传播论。《新闻与传播研究》，(8)，110-125+128。
- 杨星星，唐优悠，孙信茹(2020)。嵌入乡土的“微信社区”——基于一个白族村落的研究。《新闻大学》，(8)，1-15。
- 杨懿(2020)。符号学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基于贵州茶的观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1)，60—63。
- 姚锦云(2019)。再论庄子传播思想与“接受主体性”——回应尹连根教授。《国际新闻界》，(2)，132-152。
- 姚锦云(2020)。论中国传播史研究的想象力与典范性探索——评《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国际新闻界》，(10)，144-158。
- 姚锦云，邵培仁(2018)。华夏传播理论构建试探：从“传播的传递观”到“传播的接受观”。《浙江社会科学》，(8)，120-259。
- 尹连根(2017)。审慎对《庄子》进行传播学层面的“本土化”——与邵培仁、姚锦云两位老师商榷。《国际新闻界》，(5)，155-173。
- 尹连根(2020)。庄子与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新闻与传播评论》，(6)，99—110。
- 尹韵公(2020)。《水浒传》里的信息表达和呈现。《新闻春秋》，(3)，49-54。
- 余也鲁(2015)。《万水千山都是诗：余也鲁回忆录》。香港：海天书楼。
- 余英时(1999)。《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张兵娟，李阳(2020)。传播学视角下中英“礼仪之争”再审视。《新闻与传播评论》，(5)，102-115。
- 张兵娟，王闯(2018)。传播史上的孔庙祭祀礼制及其当代价值。《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

学学报》》，（1），29-34。

张丹（2020）。以乐观礼：中国古乐的媒介功能观。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论文。厦门。

张国良（2018）。传播学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贡献。《国际新闻界》，（2），118-122。

张明新，陈佳怡（2020）。“上下交而同其志”：《论语》中的政治信任建构——以政治传播为视野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1），69-86。

张荣强（2019）。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中国社会科学》，（9），180-203。

张涛甫（2018）。影响的焦虑——关于中国传播学主体性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123-132。

张咏华（2019）。中国传播学研究迈向本土化/中国化过程的脉络——从14次中国传播学大会的角度。《新闻记者》，（1），63-70。

张振宇（2021）。危机、仪式与权力：先秦两汉禳灾活动的传播学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7），92-108。

赵晟（2019）。作为媒介的身体——儒道身体交往观的系统考察。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论文。厦门。

赵妍妍（2021）。一种儒家传播学思想中的自我观：兼与芝加哥学派自我观比较。《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67-71。

赵云泽，楚航（2017）。中国古代传播媒介“露布”政治功能考察。《新闻春秋》，（1），19-22。

赵云泽，董翊宸（2019）。中国上古时期的媒介革命：“巫史理性化”与文字功能的转变及其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7），92-106+128。

赵云泽，董翊宸（2021）。宋代政府信息传播机制的内生性矛盾——以进奏院为中心的分析。《新闻大学》，（2），1-15。

赵云泽，刘珍（2020）。宋明理学的衰落与清代传播观念丕变。《东岳论丛》，（9），77-86。

赵云泽，杨启鹏（2019）。书同文：中国古代政治变化与媒介革命影响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5），29-35。

朱春阳（2020）。研究的“画术”。《新闻大学》（7），3。

庄曦，何修豪（2020）。徽州祭簿的媒介叙事与乡民记忆建构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3），24-28。